

9-2006

社會人類學家伍銳麟先生逸事述略

Guoqiang HE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9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何國強 (2006)。社會人類學家伍銳麟先生逸事述略。《嶺南學報》，新第三期，236-250。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99/vol3/iss1/11

This 嶺大文史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社會人類學家伍銳麟先生逸事述略*

何國強

中山大學

一、少年時代的伍銳麟

到今年十月十四日，伍銳麟先生病逝已經三十個春秋。今天，研究蛋民和廣州農村文化變遷等問題的學者，還不能忘記這位前輩。

伍銳麟是廣東省臺山市沖藎鎮修齊荒村人，生於1904年(農曆二月初三日)。他在幼年時期是嬌生慣養的，而且由出生到十歲時，父親伍時昌僑居外國，家裏只有他一個孩子，母親對他特別溺愛，整個童年時期都在溫暖的家庭裏度過。祖父因經營菲律賓呂宋島上的茶園失敗，回鄉作私塾教師，伍銳麟就跟他唸書，所讀的課本是《論語》、《大學》、《中庸》之類。其中的內容小孩是不大瞭解的，但他時常記得這樣一句話：「天子重賢豪，文章教汝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從那時起他就朦朧地具有「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了。又因為他的叔父在前清科舉制度下得了「進士」後到福建做大官，母親時常用叔父作榜樣，要他向叔父看齊，勤力讀書，將來可以光宗耀祖，顯姓揚名。

1914年，父親接他和母親到加拿大居住，從此他便在那裏成長。伍時昌是個廚師，經營餐館，生意漸趨好轉，於是就把兒子送進英文小學。據伍銳麟回憶說：

父親是一個頭腦頑固的守舊人物，對我管教極嚴，而少年時代的我是非常淘氣頑皮的，經常在學校裏受到老師的責打、同學的欺負，在家裏也

* 本文的原始資料來自中山大學檔案館所藏已故人員類檔案中之《伍銳麟》(兩卷本；卷宗號：YG-0093)。文中所述各事之據此史源者不分注，以免過分繁瑣。

常被父親打得體無完膚。這種打罵使我獲得頑強的性格。在這個時期我看了幾本名人傳記，例如英國人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寫的《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英國作家燦活(Lord Charnwood, 1864-1945)的《林肯傳》(*Abraham Lincoln*)、德國作家路德維希(Emil Ludwig, 1881-1948)的《拿破侖傳》(*Napoleon*)等。我讀了這幾本書之後，覺得我的精神有了寄託，我認為整個人類歷史是一本英雄人物的傳記史。我也決心做一個英雄。^[1]

伍銳麟是在溫哥華的納爾遜小學讀書。納爾遜(Horatio Nelson, 1758-1805)是英國海軍名將，他將拿破侖(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的海軍打敗。按美國歷史教科書的講法，拿破侖在滑鐵盧(Waterloo)戰場也是被英國陸軍大將威靈頓(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 1769-1852)打敗的。聯想到英國殖民地拓展史上說的英國如何征服埃及、印度、南非及澳大利亞等，這位華工子弟深信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是最優秀的民族，而英國史是世界史中最光榮的一頁。這時候發生的一件事，在他的腦海裏留下永遠忘不了的印象。1918年，英皇太子愛德華周遊英國殖民地時，^[2]來到溫哥華(Vancouver)。他召集全城學生訓話，所講的內容是叫英皇的屬民勵行節約，省下錢來買勝利公債，使英國能迅速擊潰德國。伍銳麟幼小的心靈這樣想，他不辭勞苦，遠涉重洋來和小學生見面，為了甚麼目的？答案是因為他熱愛他的祖國，熱愛他的民族。伍銳麟被他這種精神感召。

1919年，伍銳麟在大不列顛中學唸書。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黃種人，不免受到白種人的鄙視和欺凌，使他養成一種內向的性格，外表沉悶抑鬱，不喜歡打鬧、開玩笑，而把力氣用在功課上，同別人比賽學習，讓事實嘲弄看不起他的人。結果他在考試時經常名列前茅。他對世界史、英國文學、自然科學等課程特別感興趣，成績亦相當好。他漸漸覺得自己有兩重特性：外貌與血統上是個中國人，但自己所受的教育、文化、習慣、語言和思想則是個地道的英國人。這種兩重特性使他與家庭及社會環境時常發生磨擦與衝突。他以為自己是

[1] 伍銳麟，〈自我檢討〉，《伍銳麟》，卷2。

[2] Prince Edward (1894-1972) 登位後為愛德華八世(Edward VIII, 1936年在位)，亦即遜位後的溫莎公爵(Duke of Windsor)。

一個中學的高材生，有資格在白人社會交朋結友，找份高等職業；但因為他是一個黃種人，在種族歧視下的英聯邦，這種欲望是不可能實現的。回到家裏及華僑社會，更無可能達到他的理想。他目睹周圍的華僑夢寐以求的不過是如何辛辛苦苦積攢一些錢回中國買少許田地，為兒女操辦婚事，享受天倫，終其餘生。華僑所經營的事業，不外是開餐館、洗衣鋪、雜貨店，或者是種地、做工之類。在他的心目中，這類職業都是微不足道的，以他的抱負是看不起的，於是他與家庭的衝突與日俱增。唸完中學以後，父親叫他學習經營餐館，但他素來喜歡讀書，不愛經商，母親則要他結婚成家。他卻胸懷大志，熱心求學，以成器皿，希望對國家和人類有點貢獻。他沒有理會父親發出的警告——如果不聽話就停止供給她繼續升大學的費用。1922年，伍銳麟毅然離開家庭跑到美國，考入厄本勒城的伊利諾大學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二、漫長而艱辛的大學求學期

這一行動使他與家庭的關係徹底決裂了。由於他不滿意他的社會地位，不願意做個辛辛苦苦的華僑工人，他就痛恨自己生為一個中國人，生在窮苦的華僑家庭裏。自此一直到1930年，八年中他的生活潦倒異常，既失去家庭的溫暖，又無朋友親戚可以依靠。他究竟如何生活呢？全靠半工讀維生。下課後他替教授們打掃房間、洗熨衣服、烹飪等工作，就這樣解決食宿問題。寒暑假期間去工廠或餐館做工，所得工資用來支付學費、書籍費和其他雜費。

這樣的生活迫使他投入到美國社會各階層中去。他在農場幹過季節工人，在工廠當過工人，當過家庭雜役、商品推銷員、教堂傳教者、青年會書記等。他初到美國時十分崇拜美國的物質文明，嚮往美國人的民主。時間一長，他又發現大多數美國人是信教的，聯想到美國的富強，科學的發達，他認為這些都是建築在宗教基礎之上的。從那時起，他開始到教堂去祈禱，參加主日崇拜。1926年他受洗，並有了Paul Wu (伍保羅) 的教名。

初進伊利諾大學的時候，他想讀醫科，可是沒有成功。這一方面由於經濟困難和身體孱弱，另一方面是他發覺自己有雄辯才能，於是選讀哲學。他英文好，閱讀不甚吃力。哲學教授麥古禮是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的學生，受其影響，所以伍銳麟的哲學思想一方面是傾向於杜威的實用主義；以後他受了另一位叫藍拔 (Tamprecht) 的教授影響，轉成為新康德主義 (New Kantianism) 者。再後來，便發展為宗教的客觀唯心論者。

在伊利諾大學時，有兩件事使這個年青人崇尚奮鬥的思想加深了一層。1926年，化學系一位教授霍普金斯(B. S. Hopkins)發現一種化學元素，取名為Illinium，用以紀念該校。在大學的演講會上，霍普金斯報告他發現元素的經過及此種元素的重要性，當場受到各科學團體贈予獎狀、會員證和研究獎金等。伍銳麟因而得到啟示，決意尋找機會當大學教授，希望在學術上有所貢獻。

另外一件事就是伊利諾大學生物系有位姓宮藤(Kudo)的日裔博士，他的夫人是白種人。這使伍銳麟感到，只要有本事，亞洲人也可以娶到洋太太。

伍銳麟把出人頭地的意念，以及對國家和人類作出貢獻的抱負這兩種思想扭結成一股持久的學習動力。他的成績很好，經常在班裏考一二名，讀完學士(B.A., 1926)，又讀碩士(M.A., 1927)，然後轉往紐約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修讀，獲得神學學士(B.D., 1930)。他在讀大學時期獲得品學獎、文科最高榮譽的金鑰匙獎(Phi Kappa Epsilon)、哲學獎(Graduation with High Honor)和論文獎。

三、首次執鐸嶺南

從神學院畢業之後，伍銳麟正準備去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忽然接到紐約嶺南大學美國基金委員會(American Foundation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秘書格蘭(William Henry Grant, 1859-1934)的信，說鍾榮光(1866-1942)校長邀請他為該校歷史政治系講師，問伍銳麟有無應聘之意。

怎會無意？早在三年前，伍銳麟獲得碩士學位時，就曾寫信給教會創辦的這所私立大學的首任華人校長鍾榮光申請工作。當時學校受省港大罷工的影響，不準備增添教師，求職的要求被婉謝了。鍾校長現在主動發聘書，機會難得，自然不可錯過。但離開熟悉而富裕的社會，回到陌生而貧窮的故國，心裏畢竟會產生幾分錯綜複雜的感情。經過一番思考，伍銳麟終於決定接受聘請。他當時是這樣想的：再過三四年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才回國，年齡已不低於三十，雖然有最高學位，但自己不識中文，對國情一無所知，能否適應環境是個問題。況且伍銳麟那時候剛與美麗的德裔女朋友分手，伍銳麟很愛中國，她卻不肯離開美國，因此伍銳麟想換一個環境生活，忘掉這段戀情。伍銳麟自然也想到，雖然自己於1930年9月被美國長老會封為牧師，隨時可在美國或加拿大就任，但是做一個牧師畢竟不如做一個大學教師體面。他認定教育救國比宗教救國實在可行。伍銳麟的母親早已回國，身患重病，母子倆八年未見面了，與母親謀

面，是他夢寐以求的，這也是促成他回國的一個原因。

回到廣州以後，伍銳麟發現嶺南大學的環境與氣氛比較適合他的要求。他不曾說國語，但教西歐史和社會學都可以用英文講授。嶺南大學專向港澳、南洋和美洲富裕的華僑子弟招生，華僑都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受到祖國的教育，不願再看到孩子僅讀洋書，變成「洋人」，這與伍銳麟的心理很合拍。學校位於市區珠江對岸河南島康樂村旁邊，環境幽靜，設有附屬小學與中學，招收學生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每一班的課室樓上就是這個班的宿舍，大約住三十來個學生。每個班有自己的食堂，有一個專門負責管理的教師和一個褸姆，從學習到生活，學校完全負責。家長把孩子送來，除了向學校交學費、膳宿等費用，另外還交一筆生活費給學校，看病、添置衣服都由學校代辦，每個學期學校將成績單、帳目單一同寄給家長。這種封閉式的教育方式是伍銳麟所熟悉的。況且英文沒有被忽視，附小從五年級開始就學英語，從附小到附中，再到大學，英文訓練一以貫之，就算中途從國外插班的華僑子弟，英文也沒有甚麼問題。所以嶺南大學的學生，即使其他學科的成績較差，但英文總有點根柢，不但聽得懂英語，而且還能在堂上用英語問答、討論、筆試和寫學期論文。這樣伍銳麟不懂國語的語言難關就迎刃而解了。在社交方面，由於伍銳麟在國外居住多年，廣州人的風俗習慣不甚清楚，故被譏諷為「唐人、番鬼」，但他覺得這沒有甚麼了不起，嶺南大學的外籍教師不少，最多時達四五十人，他可以同他們交往，不會感到孤獨。

嶺南大學外受紐約美國基金會領導，內受董事會制約。紐約美國基金會要使嶺南大學有號召力，吸引更多的學生，不能不請具有真才實學的中國人到學校教書。由於學校講究真實本領，很多第一、第二流的人才反倒不是外籍教師，而是中國人。伍銳麟不怕競爭，競爭可以激發出他的聰明才智。他幹得很開心，其執着的敬業精神得到同仁的認可，1932年被學校的斐陶斐勵學會 (Phi Tau Phi) 接納為成員，^[3] 1942年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教授三等獎狀。

[3] 斐陶斐勵學會的英文名稱是 Phi Tau Phi Scholastic Honor Society。斐陶斐代表三個希臘字母 Phi Tau Phi，用來標誌哲學 (Philosophy)、工藝 (Technology) 和物理學 (Physics)，意指斐陶斐勵學會的成員是擁有這三門學科知識的人。斐陶斐是摹仿美國大學的 Phi Beta Kappa (文科勵學會) 和 Sigma Xi (理科勵學會) 的規章制度和組織方式設立的，只是斐陶斐文理兩者兼有。

伍銳麟在嶺南大學的工作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1930年至1943年。這一期間他先後在歷史政治系、社會學系當過講師、副教授、教授，並擔任過社會學系主任。主講的課程有社會思想史、社會調查方法、農村社會學、都市社會學等。1932年春，他和陳序經(1903-1967)共同創立社會研究所，^[4]自任所長。研究所成立之初沒有經費，他們就用自己的工資去做調查。他和陳序經一道進行廣州沙南、三水河口蛋民情況的調查。為了同1932年霍馬恩(Bernhard Hormann)進行的新鳳凰村的調查相互映證，他和黃恩憐等一起做過舊鳳凰村的調查，並和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楊成志、王興瑞、江應樑諸氏深入海南島黎族與苗族地區調查。他帶領學生實習社會調查工作，曾以廣州市人力車夫為研究課題。

1937年，伍銳麟又和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楊成志教授、王興瑞、江應樑諸氏深入到海南島黎族與苗族地區調查。1938年，他和學生冒着日本飛機的騷擾，到與康樂園一牆之隔的下渡村做調查。康樂的嶺南大學沒有像石牌的中山大學那樣設立有人類學系，但在康樂，社會學與人類學是一爐共冶的。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從社會學在中國的近百年學科發展史來看，其中始終蘊含着一種人類學的傳統」。^[5]伍銳麟等雖名義為社會學系的教師，實際上從事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屬於文化人類學的。他們注重調查對象的特殊風俗習慣及禮儀，留意文化延續的歷史與整體表現。例如，在對現中山大學北門碼頭對岸二沙頭島沙南村的調查中，一部分目的即為：(一)選擇典型，瞭解蛋民的生活方式；(二)找出蛋家所面對的問題；(三)搜集蛋民的起源歷史及發展；(四)

^[4] 陳序經，海南島文昌縣人，1903年9月1日出生。父親是華僑工商業者，1920年入讀嶺南中學。192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1927年獲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1928年受聘嶺南大學任教至1929年，然後到德國訪問一年，1931年回嶺南大學教書至1933年，1934年起任南開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和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當過政治經濟學院院長，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1944年至1945年到美國作訪問學者，1947年受邀到嶺南大學做校長，試用一年，1948年正式被聘為嶺南大學校長，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中山大學副校長，主管基建與財務，1962年，調任暨南大學校長。1964年調南開大學任副校長，1965年報到。陳序經在北方是有名的「老南開」，在南方是有名的「老嶺南」。他在北方與南方的聯繫都很廣泛。他不僅是一個教育行政管理專家，而且是一個著名的學者，他留下的學術著作有十種之多。

^[5] 胡鴻保，〈中國社會學中的人類學傳統〉，《黑龍江民族叢刊》，1998年4期(1998年)，頁166。

取得蛋民的合作，用教育或其他方式改善他們的情況和生活標準。他們不僅採用社會學問卷方法進行訪問，還引進人類學的方法來改造當時的社會學，因為人類學注意文化的個性，強調研究者通過田野作業來獲得材料和增加主位的感受。伍銳麟本人很偏愛文化人類學，前面提及他於1930年9月間打算去芝加哥大學讀博士，伍銳麟為自己選擇的專業就是人類學，他知道功能學派的代表派克 (Robert Ezra Park, 1864-1944) 在那裏執教。他當嶺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時，提倡本系學生選修人類學和民族學的課程。先後教授人類學課程的是霍真 (Reo F. Fortune)、高維雅 (Charlotte Gower)，兼任民族學課程的是岑家梧 (1912-1966)。教學計劃中還安排有語音學，主講者是高華年。這三門課現在都是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民族學專業學生的必修科。1940年，香雅各 (James McClure Henry, 1880-1958) 為伍銳麟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申請獎學金，^[6] 希望幫助他前往該校研究人類學。眾所周知，著名的女人類學家本潘乃德 (Ruth Benedict, 1887-1948) 就在這所大學任教，可惜申請沒有成功。

1936年8月，伍銳麟在廣州星期四俱樂部 (The Canton Thursday Club) 發表關於艇家 (即蛋家) 的演講，以在沙頂、沙南村的蛋家共一百五十戶計八百人作為例子，說明蛋家的經濟、勞動組織、教育、治安等社會外貌，以及婚禮、家庭、信仰、生和死的儀式、道德標準等不同文化層面，博得到會者熱烈的掌聲。

嶺南大學社會研究所於1937年春更名為西南社會調查所，1948年秋再易名為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該所同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夏威夷的太平洋國際關係研究會、中國基金會、廣州市政府社會局等機關團體都建立與保持合作關係。

四、社會工作五年

抗戰期間，嶺南大學因時局之變遷徙多次。1943年8月 (時嶺南在曲江)，伍銳麟因與校長李應林 (1892-1954) 等不和，^[7] 退出嶺大，到國際救濟會廣東分會

^[6] 香雅各是嶺南第六任外監督 (校長)，亦是外籍人士任監督的最後一人。他是嶺南第二任監督香便文 (Benjamin Couch Henry, 1860-1901) 之子，在廣州出生和長大，有「廣州通」之稱，1949年後任嶺南美國基金會的監督。

^[7] 李應林應是第二任嶺南大學華人校長，在位期間學校狀況甚糟。這與國難當頭，各種矛盾容易暴露有關，也與他知識與德行的欠缺有關，結果弄得學生、教職工、校董事會、美基會四方對他都不滿意，1948年被迫卸任。

任執行幹事。1944年，他被當時的廣東省省長李漢魂(1896-1987)聘為省政府參議。

國際救濟會廣東分會是一個非官方的社會慈善機構，1943年7月由曲江基督教青年會戰時緊急救濟會改組而來，主要接受美國教會援華會的津貼，還接受美英等國紅十字會、英國教會援華會、全加拿大助華會、新西蘭海外慈善事業會、聯合國救濟總署、聯合國兒童救濟會、各地華僑慈善團體籌集的物資和款項資助，以援助因戰爭與自然災害在廣東境內造成的難民。該會1943年至1944年設在曲江，1944年曲江失陷，該會遷移到粵東興寧。1945年由興寧遷回廣州。該會在臺山、德慶、肇慶、清遠、羅定、連縣、海豐、陸豐、揭陽、甲子、汕尾、梅縣、興寧、老隆、惠州、廣州等地設有服務站，共僱用職員百餘名。分會實行委員會制，有委員十二人，中外人士各半，委員屬於義務制，不受薪。外籍委員絕大多數人是傳教士，各與他們傳教區域內的服務站保持密切聯繫。執行幹事為受薪職位，職責是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幫助委員會主席策劃和組織各服務站的救濟工作。

救濟會的待遇在當時算是好的，不僅工資比其他機關高，而且發港幣，不受金元券貶值的影響，還有廉價的配給品供應，福利包括職工和家屬的醫療費、子女入學費可以報銷。伍銳麟是分會的實權人物，人事安排、救濟決策，各項大事無不與他有關，薪金比別人高，出門可以乘坐吉普車。為了保證救濟物資的順利發放，也為了照顧自己的學生，他把嶺南大學社會學系的許多畢業生介紹到分會去工作。

1946年至1948年，香雅各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廣東分署副署長，對伍銳麟大力支持，兩年間撥給港幣四十萬元，物資三千餘噸，汽車二十多輛，醫療器械一大批，使伍銳麟能夠辦很多事情。為了寓救濟於生產，幫助復原與建設，使救濟金產生更好的效益，在他和美國援華會駐廣東國際救濟會督導米爾斯(V. J. R. Mills)的推動下，1946年至1947年間，廣東分會用了二十萬港幣，按以工代賠的方式資助清遠石角圍堤的修築。該堤長二十二公里，戰時被毀，完工的當年立即見效，避免了清遠和番禺受到水災的威脅；1947年至1948年，用了二十萬港幣在開平縣沙崗鄉梁金山山腳建成水庫，可灌溉三千畝地，使旱地變為水田，稻穀由每年種植一造變為種植兩造，該鄉特產「火蒜」(可做紅油的基底原料)增產一倍，每年僅火蒜一項出口便可多收外匯五六萬港元；還資助完成開平縣草水口至三埠(長沙、狄海、新昌)十五公里長的公路建設，使四地交通更為快捷；貸款一千萬元國幣給石灣一家陶瓷公司恢復生產，兩年後貸款還清；還在臺山和清遠開闢苗圃，清遠種植柑、桔、橙等果樹，臺山苗圃專種森林及

風景樹苗，培育樹苗出售。這一期間，伍銳麟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專業，通過資助民族文化的整理和挖掘，推動傳統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因此曾進行汕頭抽紗業的調查、石灣陶業的調查、陸豐甲子港蛋民的調查。從1944年起，伍銳麟又陸續兼任廣東省政府參議、聯合國兒童急救會總幹事等五六種社會職務。用伍銳麟自己的話說，五年的寶貴光陰他是在大學外面度過的。

五、嶺南重執教鞭

伍銳麟在嶺南大學的第二階段從1948年9月至1952年院系調整。1948年10月，陳序經從南開大學到嶺南大學正式就任校長，伍銳麟與陳序經是伊利諾大學的同學，又是連襟兄弟，^[8]他樂意助老同學一臂之力，重返嶺南大學，當任總務長、校長顧問委員會委員，主管學校財政，並兼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主任。但國際救濟會的工作也離不了他，由此他招到一些人妒忌，說他身兼兩職，兩面受薪，有人想倒他的臺，沒有成功。但也有一些人認為他孩子多(他有五個孩子)，身體又不好，對他抱理解的態度。

過去嶺南大學的經費主要來自學生交繳的學費雜費(約佔六成)，美國教會基金、華僑捐款、政府撥款等各佔另外四成的一部分。此外，不同時期還會有一些不同的經費來源。伍銳麟做總務長期間，開闢新的經費來源，他源源不斷地把一些救濟物資調撥給嶺南大學。1951年7月，回國四年的社會學系教授楊慶堃(1911-1999)走了，此時伍銳麟已卸去救濟會執行幹事職務，遂於8月接替楊慶堃做系主任，兼任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所長，後來他連總務長職務也辭去，全副精力投入到教學工作。他注意同學的能力培養，告誡同學做論文不能光靠檢索報紙和摘抄文獻，要從實際調查中獲取材料，學會與各類調查對象打交道。他推崇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說他自己就是用這種方法做調查。1952年9月，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併，社會學系和西南社會經濟所撤銷，伍銳麟被調到中山大學西語系教英文。

[8] 陳序經的妻子黃素芬與伍銳麟的妻子黃素蓮為親姊妹，後者叫前者為「二姐」，稱陳序經為「經哥」。

六、最後的歲月

1952年10月至1953年5月，廣東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一個廣東蛋民調查隊到潮汕一帶，和珠江三角洲的江門、中山，北江的清遠縣和曲江縣，以及陽江縣的閘坡做調查，瞭解廣東蛋民是否具備條件劃歸為少數民族。當時，廣東省民委設在廣州市米市街的統戰部大樓內。廣東蛋民調查隊隊部設在越秀山麓體育場東北面的廣東民族學院內，隊長由統戰部副部長饒彰鳳擔任。調查隊下屬兩個小分隊：一分隊負責東江水系及粵東沿海蛋民的調查，由舊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羅致平任隊長，青年教師容觀瓊任副隊長；二分隊負責珠江、北江水系和陽江一帶的內河與沿海蛋民的調查，伍銳麟為隊長。隊員以能否講潮州話或廣州話為各隊分配標準。調查隊成員屬於舊中大的有林嶽玉和六七個人類學系的畢業生，屬於嶺南大學的有錢松生、劉耀荃。各小分隊另配一位民委幹部。調查專案：(一) 蛋民的來源、歷史和演變；(二) 蛋民的政治地位；(三) 蛋民的經濟情況；(四) 蛋民的風俗習慣；(五) 蛋民的語言、文字和歌謠；(六) 蛋民區別於陸地居民的特徵。調查結果由廣東省民委出版三冊報告。

調查完畢在民族學院作總結時，中央統戰部派劉格平副部長來廣東聽取意見。一分隊提出潮汕一帶的蛋民可以劃為少數民族，二分隊則提出相反的意見。兩種看法都有其客觀事實為基礎，這就值得繼續調查研究，才能作出決定。廣東省蛋民的調查與識別告一段落，等待中央統戰部下一步的部署。這個部署就是聽取蛋民自己的意見。蛋民普遍不願意政府把他們劃歸為少數民族；相反，他們強烈要求政府允許並幫助他們遷居到陸地，使能享受與陸上居民同等的待遇。政府接受蛋民的意見與請求，幫助世居水上的蛋民遷至陸地安家落戶，把問題圓滿地解決了。

1956年11月，伍銳麟加入中國九三學社。1958年，有人抓住他在「九三」學社小組會上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時說過的幾句話做文章，劃他為右派。他從五級教授降為六級副教授，九三學社給予他留社待查處分。一些同事、朋友與他斷絕來往。1960年，他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2、3月，中山大學黨委和廣東省委文教政治部，先後認定伍銳麟屬於錯劃之列，決定給予改正，恢復政治名譽，撤銷錯誤的處分。當家屬拿到平反書，伍銳麟先生已病故七年零四個月(他逝世於1971年10月14日)。最感人的是他在病危時，仍惦記着系裏的工作。他去世之後，家人遵其遺囑將他生前的書籍贈送給中山大學外語系，一共拉了七板車。

七、伍銳麟的成就及其影響

伍銳麟的學術成果是在嶺南授課第一階段時留下的，有八篇重要的論文和調查報告：

1934年：〈沙南蛋民調查報告〉，《嶺南學報》，3卷1期(1934年1月)，頁1-151(作者署名「嶺南大學社會研究所」，或未必能單算為伍銳麟一人之作)。

1935年：〈舊鳳凰村調查報告〉(與黃思憐合著)，《嶺南學報》，4卷3期(1935年8月)，頁93-162。

1936年：〈三水河口蛋民生活狀況之調查〉，《嶺南學報》，5卷2期(1936年8月)，頁1-53。

1936: Wu Yuey Len, "The Boat People of Shanam: A Statistical Study of Production in Economic Conditions,"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9:3 (1936), pp.615-665.

1937: Wu Yuey Len, "Life and Culture of the Shanam Boat People,"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9:4 (1937), pp.807-854.

1939年：《中國人力車夫的研究》(與白銓合著)(廣州：嶺南大學西南社會調查所，1939年)。

1940年：《廣州市六百人力車夫生活狀況之調查》(廣州：嶺南大學西南社會調查所，1940年)。

1941年：〈廣州市河南島下渡村七十六家調查〉，《嶺南學報》，6卷4期(1941年6月)，頁236-303。

1948年：《三水蛋民調查》(廣州：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1948年)。

兩篇英文論文刊登後，引起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的注意，該會於1937年給伍銳麟寄來會員證。

第二階段(包括合併後中山大學時期)沒有留下甚麼學術成果(那本蛋民調查小冊子是《嶺南學報》4卷3期之文的修訂本)，主要原因是伍銳麟身兼數職，既要盡力應付行政工作，又要開會，還要上英文課。更加重要的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寫不完的檢查，受不盡的批判，棍子滿天飛，沒有做研究的條件。

伍銳麟是個學者型的人物，平時喜歡讀書，不愛出頭露面，與同事或學生

交際不多，不苟談笑，與外國人交往有時亦如此，除了嶺南大學教職工星期五的茶會以外，他很少有請客吃飯之類的活動。大家對他談不上敬重還是討厭。英美人士則對他表示好感。為甚麼他會受到英美人士的賞識呢？伍銳麟回答得很簡單：「我在加拿大長大，後來又到美國留學八年，信了基督教，讀了三年神道學，還被封為長老會牧師」。他的英文好，有在英語國家接受教育的文化背景，這固然是他易於與外國人溝通的原因。此外，他個性直率、辦事認真、工作能力強，也頗易贏得外籍人士好感。美國基金會駐嶺南大學代表、理學院院長富倫 (Henry S. Frank) 說伍銳麟是個炮筒子，心裏攔不下東西。另一位美國人，歷史政治系主任包令留 (Henry C. Brownell) 說伍銳麟是一頭勤勤懇懇地為嶺南大學工作的老黃牛。

最值得慶幸的是，伍銳麟在1930年至1943年進行的都市邊緣的農村研究後繼有人。

1947年夏天，楊慶堃從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回國，即被嶺南大學聘為文理學院社會學系主任。楊慶堃到嶺南大學不久，就開始計劃在學校周邊的農村開展社區研究 (community study)。他舉出四點理由說明社區研究的原因和目的，其中的一點是嶺南大學的伍銳麟等人在抗日戰爭前曾經在學校附近農村進行過社會調查，因此，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經驗可供參考，楊慶堃等從事農村社區調查正是繼承嶺南大學社會學系過去的傳統。^[9] 1947年至1949年，楊慶堃每年都帶些學生下鄉做調查。起先以舊鳳凰村、五鳳村和康樂村為調查對象，後來集中進行鷺江村的調查。^[10] 他多次跟學生提到伍銳麟早年對舊鳳凰村和下渡村的研究，督促學生閱讀伍銳麟等人發表的有關調查報告，並邀請伍銳麟幫忙指導學生。1949年元月，黎素菊、方輝生、高濟深等七人寫成兩萬餘言的《舊鳳凰五鳳康樂三村農村經濟調查統計報告》；1950年劉耀荃寫成《鷺江的權力結構》；張淑芳和黃定國寫成《鷺江村四代階級及其職業流變》；正寶傑寫成《鷺

^[9] 參看劉耀荃，〈嶺大社會系系主任楊慶堃在鷺江村搞的社會調查〉，《廣州文史資料》，13期（1964年5月），頁142-143。

^[10] 據劉耀荃、正寶傑和黃敬昌回憶，1947至1949年參加鷺江村調查的學生有劉耀荃、徐展華、正寶傑、張淑芳、黃定國、談文煥、簡慕貞、王玲和王美娟。部分學生後來就以自己的調查材料在楊慶堃的指導下寫成畢業論文。這些論文現存於廣州中山大學。參看劉耀荃，〈嶺大社會系系主任楊慶堃在鷺江村搞的社會調查〉；正寶傑，〈關於鷺江村調查的回憶〉，《廣州文史資料》，13期，頁150-153。

江村家族與祭禮調查》；簡慕貞和談文煥寫成《鷺江兒童家庭教養調查》。其中，黎素菊等三人的報告集中報道舊鳳凰等三村的農業經濟情況，不但描述細膩，還貫串許多獨到的分析，是學生畢業論文中的上品。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不時有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選擇鷺江村做調查以便撰寫自己的畢業論文。雖然他們沒有去到伍銳麟調查過的村莊，但這些後來人受伍銳麟、楊慶堃等學術前輩精神的鼓舞是毫無疑問的。2000年上半年，筆者同孫慶忠博士研究生一起帶領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四年級的八位學生沿着伍銳麟等前輩學者走過的路繼續做田野調查。這八位學生中，四位到舊鳳凰村，兩位到下渡村，兩位到鷺江村，共完成五篇計七萬多字的調查報告。其中，《舊鳳凰村的經濟生活和社會變遷》(嚴麗君和吳翠明)、《城市裏的宗族：廣州市海珠區F村吳氏宗族生活的調查》(李國權)、《舊鳳凰村的宗族組織和結構》(葉林)、《從鄉村到都市：廣州城鄉結合部下渡村落調查》(馮瑩和陳毅敏)追溯六十年來舊鳳凰村和下渡村的變化軌跡，指出當年伍銳麟的預言「舊鳳凰村是由農村社會而變成城市化了，即是說此村已成為廣州市的附庸無疑」已經成為事實。^[1]這兩村將和許許多多城市周圍的村莊一樣，終會不可避免地淪為城市的一部分。

當年伍銳麟和陳序經共同從事的蛋民調查研究也後繼有人。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博士研究生何家祥目前正在三水河口、赤溪以及中山的沙田區從事蛋民的田野調查。河口蛋民已經由六十年前的二百餘戶近一千人發展到現在的五百多戶計二千多人。不僅人口增長了一倍，他們的謀生方式、居住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篇題目預定為《珠江流域的水上居民》的博士論文將用相當大的篇幅敘述河口蛋民的文化變遷。可以說，伍銳麟的治學精神、他的研究成果正在為新一代的學者所繼承。

[1] 伍銳麟，〈舊鳳凰村調查報告〉，頁95。